

政治联系、环境政策实施与企业生产效率

于文超¹ 何勤英²

(1.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重庆 401120;2.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74)

摘要:政治联系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也会影响政策法规的实施效率。本文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切入点,基于世界银行2004年的企业调查数据,考察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当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滞后一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政治联系并未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但政治联系会弱化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以上结论说明,构建规范的政企关系、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率和约束力度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政治联系;环境规制;企业生产效率;波特假说;遵循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14)02-0143-07

一、引言

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政治联系对于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政治联系固然能通过其资源效应、信息效应为企业发展带来短期优惠,但政治联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如何,有待我们的深入研究。一些文献尝试从研发投入、技术创新绩效、生产效率与投资者保护法律的执法效率等维度对政治联系的长期影响做出考察,然而,政治联系是否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上述文献并未得到一致结论。

为了深入考察政治联系对企业发展的长期影响,本文将关注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与环保政策实施效率的影响。自1996年以来,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一直以年均29%的速度增长,其中2011年重大环境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20%,特别是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呈高发态势^①。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提升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率成为普通公众和政策制定者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在中国目前的环境治理体系下,很多企业通过比较排污成本和收益来确定最优排污水平,从而造成了规制政策对企业污染行为的软约束。

“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自身竞争力。“波特假说”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在企业层面得到有效实施,企业成为独立承担环保责任的市场行为主体。然而,政治联系不仅会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效率,也会影响企业在面对环境

收稿日期:2013-12-24

作者简介:于文超(1987—),男,山东潍坊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

何勤英(1978—),女,江西鄱阳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规制政策时的策略选择,政治联系所带来的政策资源会干扰和削弱企业在核心能力建设上的努力^[1]。在面对环境规制约束时,政治联系较强的企业可能不会像“波特假说”所阐释的那样通过产品、生产工艺创新来提升自身生产效率,而是通过寻求政策资源和政府帮助来获得竞争优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世界银行2004年的企业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综合考察政治联系与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交互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国内文献多基于地区或行业层面数据对“波特假说”展开检验,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并不多,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为“波特假说”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并深化了我们对企业政治联系的认识;第二,本文利用世界银行调查数据中丰富的政治联系信息,综合考察了环境规制水平与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交互影响。结果显示,政治联系虽然减弱了当期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但弱化了严格环境规制对企业效率提升的激励作用,从动态角度看,政治联系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存在不利影响。

二、理论分析

大量文献考察了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早期美国企业数据的研究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将显著降低企业生产效率。相比之下,自从“波特假说”提出之后,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对于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存在积极作用。同时,考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对于国内学者而言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国内多数文献以地区或行业层面数据为样本,在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展开相关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张三峰和卜茂亮、童伟伟和张建民都以我国的企业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波特假说”进行了实证考察^[2]。

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政治联系对企业的治理机制、所获取政策优惠与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直接考察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影响的文献并不多。作为衡量企业长期绩效的重要指标,生产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于文超和何勤英的研究发现,政治联系对上市公司生产效率没有直接影响,但政治联系会减弱非生产性支出对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3];李维安和徐业坤的研究则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能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且这一影响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更明显^[4]。与上述文献多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不同,本文将使用更具代表性的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考察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本文认为政治联系将通过如下几种途径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其一,政治联系能够帮助企业从政府手中获得优势资源,并降低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政策风险,从而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提升经营效率^[5];其二,政治联系的存在不仅会耗费企业高管的精力和资源,其带来的短期利益也会弱化企业预算约束和市场竞争压力,降低企业进行生产创新和自身能力建设的积极性^[1];其三,伴随政治联系而来的政府干预将引发企业过度投资、员工冗余等问题,从而降低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6];其四,政治联系将为企业高管构建“职位壕沟”,弱化了公司治理机制和外部法律法规对高管应有的监督和约束作用^[7],进而抑制了企业高管提升生产效率的努力。综上所述,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实际影响有待于我们的实证检验。

进一步地,政治联系既会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率,也会影响企业在面临环境规制约束时的经营策略选择,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首先,中国各个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大“弹性”,这为政治联系发挥作用提供了充足空间。以较为成熟的污水排放收费制度为例,中国采用的是排污企业主动报告排污数量,地方环保部门进行随机核查的模式。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虽然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合规定,地方环保部门却难以完全实施既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往往与排污企业协商其所应缴纳的排污费。在中国现行的环境管理体系下,存在着“企业宁可缴纳排污费,也不降低排污水平”的现象,企业也将通过比较排污增加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来确定最优排污水平,这将造成规制政策对企业污染行为的软约束。

其次,为了获得更加有利的环境政策,企业会通过寻租活动“俘获”地方官员,而政治联系的存在

不仅能有效化解企业可能面临的政策风险,也为企业的“寻租”活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便利。Chen 等的研究就发现,在那些市场化程度越低、寻租空间越大的地区,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可能性越大^[8]。特别是当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时,政治联系较强的企业很可能会凭借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良好关系,弱化规制政策在企业层面的实施力度。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较强的政治联系也会弱化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内在动机,进而损害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最后,企业在通过政治联系获取丰厚政策资源的同时,也需要通过慈善捐赠、过度投资、员工冗余等方式帮助地方政府实现其相应的社会职能,如发展经济、稳定就业、增加税收等,这便是企业构建政治联系的“成本”。因此,当地方政府更加关注辖区环境保护时,政治联系不仅不会减弱环境规制政策在企业层面的实施力度,反而会带来更多的政府干预以促使企业更加严格地实施环境规制政策。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如前文所述,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是政治联系、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我们将回归方程设定为方程(1)。其中,被解释变量 TFP 表示企业生产效率;解释变量 Regu03、Regu04 分别表示城市上一期环境规制水平、当期环境规制水平^②; Connection 代表企业的政治联系,本文参照王永进和盛丹的研究构建该变量的衡量方法^[9];同时,参照 Cai 等的研究,本文加入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控制变量(Control)^[10]。

$$TFP_i = \beta_0 + \beta_1 \text{Regu}03_c + \beta_2 \text{Regu}04_c + \beta_3 \text{Connection}_i + \gamma \text{Control}_i + \mu_i \quad (1)$$

同时,本文使用对数化的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计算企业生产效率。方程(2)中,Y 代表企业经营总收入,它等于核心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K 代表企业固定资产净额,L 代表企业员工总数,M 代表企业原材料投入,变量 Industry 表示企业所处的二级行业。本文将企业投入产出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对方程(2)进行 OLS 估计得出的残差,便是企业生产效率。

$$\ln Y_i = \alpha_0 + \alpha_1 \ln K_i + \alpha_2 \ln L_i + \alpha_3 \ln M_i + \sum \phi_j \text{Industry}_j + \sigma_i \quad (2)$$

(二)样本来源和变量定义

本文的研究样本来源于 2004 年世界银行对中国 120 个城市所作的投资环境调查(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该调查包含 12 400 家制造业企业 2004 年经营业绩、公司治理结构与政治联系等方面的信息。调查的城市分布于除西藏地区之外的所有省份,每个省份的省会城市包括在内。其中,四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各抽查 200 家企业,其余城市各抽查 100 家企业。我们在估计企业生产效率时剔除掉两类企业样本:第一,方程(1)中控制变量存在缺失值的企业;第二,方程(2)中投入产出变量存在缺失值或为负值的企业。由此,本文在估算企业生产效率时实际用到的样本数为 12 280 家,考虑到样本中存在的异常值会对估计结果带来偏误,我们对连续变量(如 Human、RD 等)前后各 1%进行了 Winsorize 缩尾处理。此外,城市层面的数据如环境规制水平、人均 GDP 水平等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联系的强弱往往是内生的,生产效率的高低决定着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意愿。一方面,经营效率较高的优质企业更易建立起政治联系,政治联系被视为反映企业未来经营表现的一种重要声誉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政治联系能够帮助企业获得优惠的生产要素和资源,那些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构建政治联系,以支撑企业正常的经营发展。因此,实证方程(1)中的被解释变量企业生产效率将对政治联系产生影响。此外,还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同时影响政治联系和企业生产效率。以上问题都将导致实证估计的内生性,而解决内生性的有效方法是为内生变量寻找工具变量(IV)。参考王永进和盛丹的研究,本文采用本市其他企业政治联系变量的平均值作为该企业政治联系的工具变量^[9]。具体构造原则如下:企业 i 所处的城市为 c,企业 j 为城市 c 中其他样本企业,N_c表示企业 i 所在城市 c 的样本企业数目,则工具变量的定义如方程(3)所示。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TFP	企业生产效率,被解释变量;通过对方程(2)进行 OLS 估计得到的残差
Regu03	上一期环境规制水平,解释变量:城市 2003 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城市当年 GDP 的比重
Regu04	当期环境规制水平,解释变量:城市 2004 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城市当年 GDP 的比重
Connection	政治联系,解释变量:首先选取四个分项指标,税务局、公安局、环保局、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等四个政府部门的官员中,能够帮助企业发展的官员所占的比例 ^③ (分别标识为 Help_tax、Help_sec、Help_env、Help_soc);然后,对四个分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PCA)得到一个综合指标
Control	上一期研发投入(RD):企业 2003 年研发支出与固定资产净值之比
	企业人力资本(Human):企业高中及以上学历员工的比重
	是否为外资企业(Foreign):若企业为外资企业,Foreign=1;否则,Foreign=0
	是否为民营企业(Private):若企业为民营企业,Private=1;否则,Private=0
	是否为出口企业(Export):若企业为出口企业,Export=1;否则,Export=0
	企业年龄(lnAge):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
	企业规模(Size):企业员工数的自然对数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gdpper):城市 2004 年的人均 GDP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文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按照本文衡量方法,在调查所涉及的 120 个城市中,2003 年和 2004 年环境规制水平最低的城市均为周口市(0.015%、0.086%),2003 年和 2004 年环境规制水平最高的分别为秦皇岛市(7.132%)和西宁市(19.734%)。2004 年人均 GDP 水平最高的城市为东莞市(7.200 万元),最低的城市为天水市(0.362 万元)。进一步关注企业层面的数据,变量 RD、Human、Age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存在较大差异,离散系数分别为 3.083、0.555、1.024,这说明不同企业在研发强度、人力资本存量、成立年限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变量 Export 的均值为 0.377,可见有 37.7% 的样本企业为出口企业。除此之外,衡量企业政治联系强度的分项指标也存在明显差异,最大值达到 100%,而最小值为 0。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FP	12 280	0	-0.096	0.737	-4.452	5.656
Regu03(%)	12 280	2.164	1.919	1.333	0.015	7.132
Regu04(%)	12 280	2.376	2.031	1.952	0.086	19.734
RD(%)	12 280	5.234	0.124	16.112	0.000	117.766
Human(%)	12 280	49.708	50	27.590	3	100
Export	12 280	0.377	0	0.485	0	1
Foreign	12 280	0.138	0	0.345	0	1
Private	12 280	0.644	1	0.479	0	1
Age(年)	12 280	12.566	8	12.871	2	57
Size(对数)	12 280	5.622	5.561	1.479	1.792	13.502
gdpper(万元)	12 280	1.971	1.539	1.418	0.362	7.200
Help_tax(%)	11 842	42.563	30	38.921	0	100
Help_sec(%)	11 267	38.492	20	39.411	0	100
Help_env(%)	11 444	39.356	20	39.291	0	100
Help_soc(%)	11 601	40.544	25	39.562	0	100

注:在下文的回归中,为了调整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本文将方程(2)得出的企业生产效率 TFP 乘以 100 后作为方程(1)的被解释变量,这不会改变所估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

(二) 回归结果分析

在对方程(1)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之前,我们需要对内生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④,对工具变量进行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检验结论如下:(1)内生性检验表明变量 Connection 确为内生变量;(2)识别不足检验拒绝了工具变量是内生的这一原假设,而弱工具变量检验没有拒绝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之间强相关这一原假设。综上所述,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进一步关注实证方程的回归结果。表 3 中第(1)、(2)列的结果显示,变量 Regu04、Regu03 的系数分别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和正,这说明,较高的当期环境规制水平将显著降低企业生产效率,而较高的滞后一期环境规制水平将显著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因此,从动态的角度看,“波特假说”是成立的。对此,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当期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会增加企业污染治理支出,减少企业的生产性投入,但从企业的动态决策过程看,上一期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革新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变量 Connection 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未产生直接显著的影响,这与于文超和何勤英得到的结论一致^[3]。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政治联系会降低外部政策风险并带来丰厚的政策资源;另一方面,政治联系会弱化企业提升生产效率的内在激励,降低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这两方面的影响相互抵消最终导致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表 3 政治联系、环境规制水平与企业生产效率

	(1)OLS	(2)2SLS	(3)2SLS	(4)2SLS
Connection		-0.742 (0.709)	-4.507*** (1.304)	-3.422*** (1.296)
Connection×Regu03				-1.140* (0.609)
Connection×Regu04			1.958*** (0.618)	2.600*** (0.803)
Regu03	3.864*** (1.046)	3.728*** (0.590)	2.558*** (0.724)	2.404*** (0.751)
Regu04	-2.024*** (0.569)	-2.080*** (0.404)	0.336 (0.951)	1.009 (1.134)
RD	0.522*** (0.054)	0.544*** (0.051)	0.541*** (0.051)	0.538*** (0.051)
Human	0.250*** (0.029)	0.246*** (0.026)	0.238*** (0.026)	0.237*** (0.026)
Export	4.129** (1.885)	3.625** (1.615)	3.369** (1.619)	3.211** (1.619)
Foreign	9.237** (3.660)	11.394*** (2.582)	10.583*** (2.607)	10.491*** (2.611)
Private	5.984*** (2.211)	6.433*** (1.824)	6.191*** (1.834)	5.967*** (1.842)
lnAge	-5.525*** (0.900)	-5.497*** (0.827)	-5.418*** (0.829)	-5.422*** (0.830)
Size	-1.705** (0.736)	-1.733*** (0.540)	-1.860*** (0.543)	-1.883*** (0.543)
gdpper	5.373*** (1.519)	6.094*** (0.583)	5.688*** (0.597)	5.537*** (0.612)
Constant	-14.629** (5.752)	-15.806*** (3.851)	-16.160*** (3.868)	-16.604*** (3.887)
N	12 280	11 090	11 090	11 090
R ² /Centered R ²	0.058	0.061	0.056	0.055
弱工具变量检验		3 266.816	879.830	524.995
识别不足检验		1 667.607	130.648	79.876

注:***、**、*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小括号中给出了经 white-robust 调整后的标准误。同时,识别不足检验给出的是 Kleibergen-Paap LM 值,弱工具变量检验给出的是 Cragg-Donald Wald F 值。

进一步关注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变量 RD 的系数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研发投入是显著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变量 Human 的系数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是因为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的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管理水平和更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效率也更高。变量 Export 的系数为正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出口企业具有比内销企业更高的生产效率。变量 Foreign、Private 的系数显著为正,由此可见,与国有企业相比,外资投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具有更高的企业生产效率,这与张三峰和卜茂亮的实证结果一致^[8]。变量 lnAge、Size 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是因为,那些成立年限越短、规模越小的企业具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潜力,其生产效率也更高,这与 Cai 等的发现一致^[10]。最后,我们发现变量 gdpper 的系数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从而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继续关注政治联系、环境规制水平对生产效率的交互影响。表 3 中第(3)、(4)列的结果显示:交叉项 Connection \times Regu03、Connection \times Regu04 的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正。这表明较强的政治联系在减弱当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减弱了上一期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正面影响。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在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较大弹性的情况下,较强的政治联系可能会弱化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约束力度,进而减少了企业当期“环境遵循成本”;但是从动态决策过程看,政治联系可能会导致企业对优惠生产要素和政策资源产生过度依赖,弱化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效率提升应有的激励作用。

五、稳健性分析

为了保证文章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从如下几方面入手展开进一步讨论:

第一,考虑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政府效率较高的地区既能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也能采取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提升地区环境质量,因此,在实证方程中控制政府效率能够避免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企业娱乐开支(Insti1)、进出口通关天数(Insti2)、当地企业对法庭的信心(Insti3)三个指标来测度地方政府效率^⑤,变量 Insti1、Insti2 的数值越小,变量 Insti3 的数值越大,表明城市政府效率越高。重复前文研究,文章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第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企业生产效率。我们利用 2002~2004 年数据并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程(2)以得到样本企业 2004 年的生产效率,重复文章主体部分的研究,所得结论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第三,不同区域的比较。考虑到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存在明显差异,本文进一步分区域考察政治联系、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都不显著,而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与使用全样本时的回归结果一致^⑥。进一步地,在东部地区,当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当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这一影响差异可能源于,东部地区的企业有着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能够承受环境规制水平提高所带来的“遵循成本”,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对环境规制“遵循成本”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会挤占企业的生产性投入,进而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不同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比较。前文的分析基于如下假设展开:较强的政治联系虽然会弱化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的约束力度,但会抑制企业未来在提升生产效率上的努力。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从企业所有制的角度看,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天然的政治联系,其在接受政府部门的环境监管时,有着更强的“谈判”能力。因此,一个合理的推论是,相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环境规制水平对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更弱或更不显著。我们根据所有制性质将样本企业分类,并进行分样本回归。实证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样本中,环境规制水平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相比之下,对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存在显著影响,这印证了前述推论。

六、结论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 2004 年的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政治联系与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综合影响,文章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总体而言,当期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生产效率,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将显著增加企业生产效率。从动态的角度看,“波特假说”在中国依然成立,我们能够实现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双赢”局面。除此之外,研发投入比重、企业人力资本丰富程度、所有权性质等因素也是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第二,政治联系未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直接影响。同时,政治联系虽然在短期内降低企业当期的环境遵循成本,但从动态决策过程看,政治联系将导致企业对优惠生产要素和政策资源产生过度依赖,减弱企业在核心能力建设上的努力。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公平的环境规制政策,消除所有制歧视,强化环境规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的约束力度,方能保证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激发出企业的创新活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实证研究是基于 2004 年的横截面数据展开的。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加强,环境规制水平、政治联系等因素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出哪些变化,还有待于我们使用新数据的进一步验证。在获取新的企业调查数据基础上,完善本文的研究,将是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同时,由于样本数据限制,本文未能直观考察政治联系对企业环境政策实施效率的影响,因此,对相关实证结果背后的经济学机制做出更加深入的探讨也是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 资料来源:财经网.我国环境群体事件年均递增 29% 司法解决不足 1%[EB/OL].<http://politics.caijing.com.cn/2012-10-27/112233970.html>.

② 环境规制政策可能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且这两种影响并不同步,同时加入当期、上一期环境规制水平能够更好地描述企业做出的动态决策过程。

③ 尽管环保部门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环保工作的开展与推进需要政府各个部门的密切协作,例如,《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的重点工作就有明确的部门分工。因此,本文需要关注样本企业与几个重要政府部门的政治联系。

④ 内生性检验的具体步骤为:首先,使用可能的内生变量(企业政治联系)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进行 OLS 回归得到残差 Resid;其次,将残差 Resid 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原方程中进行 OLS 回归,如果 Resid 的系数显著,则证明内生变量的确存在。

⑤ 该项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2006 年发布的《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和谐社会——中国 120 个城市竞争力的提高》研究报告。

⑥ 为了节约文章篇幅,本文未列示具体回归结果与相应检验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 [1] 杨其静.企业成长:政治联系还是能力建设? [J].经济研究,2011,(10):54—66.
- [2] 张三峰,卜茂亮.环境规制、环保投入与中国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问卷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1,(2):129—146.
- [3] 于文超,何勤英.政治联系、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与生产效率[J].投资研究,2012,(8):82—95.
- [4] 李维安,徐业坤.政治联系形式、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生产率[J].管理科学,2012,(2):1—12.
- [5] 江雅雯,黄燕,徐雯.市场化程度视角下的民营企业政治联系与研发[J].科研管理,2012,33(10):48—55.
- [6] 刘慧龙,张敏,王亚平,吴朕生.政治关联、薪酬激励与员工配置效率[J].经济研究,2010,(9):109—121.
- [7] 游家兴,徐盼盼,陈淑敏.政治关联、职位壕沟与高管变更——来自中国财务困境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0,(4):128—143.
- [8] Chen, C.J.P., Li, Z., Su, X., Sun, Z. Rent-seeking Incentives, 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Private Firms: Chinese Evidence[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 17(2): 229—243.
- [9] 王永进,盛丹.政治联系与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J].经济学季刊,2012,11(4):1193—1218.
- [10] Cai, H., Fang, H., Xu, L.C. Eat, Drink, Firms,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the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11, 54(1): 55—78.

(责任编辑:胡浩志)